

## 書評

Kyung-Sup Chang and Bryan S. Turner, eds.,  
*Contested Citizenship in East Asia: Developmental  
Politics, National Unity,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12), xiv, 266 p.

蔡博方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林端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 導言

從1980年代以來，“公民身份研究”（Citizenship Studies）在歐美社會科學界開始受到重視，並且逐漸發展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sup>1</sup>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幾年之中，“公民身份”概念從一個匯集不同研究者的爭議主題，開始演變成一個重要的研究架構。公民身份研究的興起既反映了當代西方社會的各種急遽變動，也提供了社會學者一種關照“西方現代性”的文化反思。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歐美社會科學家更進一步把公民身份研究架構，用在其他非西方社會的研究上。在相關研究成果持續積累的同時，公民身份研究者則試圖再次汲取其中的理論意涵，從非歐美社會的公民身份狀態來討論各種“另類現代性”的思考。上述說法初步勾勒了公民身份研究在社會學中展現的理論旨趣，也同時為本書的讀者們提供了第一個理解脈絡，亦即：帶有現代性理論旨趣的公民身份比較研究。



若再進一步從公民身份社會學的內部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本書正處於三個重要研究軸線的交集：1. 從T. H. Marshall公民身份架構出發的比較與修正、2. 介於民族國家與後國族格局之間的公民身份、3. 如何引入關於公民身份的規範性論述。首先，Marshall對“公民身份”的關鍵定義與其中的三元演化性質，既是當代研究者無法規避的理論資源，更是許多比較研究進行對話與修正的對象。<sup>2</sup> 其次，社會學者在當代公民身份狀態的研究個案中，都發現了某種介於民族國家框架與後國族格局之間的張力。這個張力更在經驗現象的層次上，映照出兩種不同公民身份模式。第三，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於當代公民身份狀態的憂慮，也展現出了欲重振現代公民的各種規範性倫理的關懷。這種關懷部分地在西方共和主義精神的重建找到表現，卻也不排斥其他非西方的歷史性文化資源，作為潛在的可能選項。從這個第二層的理解脈絡來看，本書正好體現了上述三種關鍵研究軸線的匯集。對於歐美社會學研究者來說，東亞公民身份狀態既提供了對Marshall架構的延伸與修正，也指出了民族/國族在去殖民過程中的轉變，更有趣的是，對於東亞社會學者來說，過去被西方學者用來理解東亞社會的主要框架——“儒家文化”——又與公民身份的現實狀態能產生什麼樣的激盪？

除了以上兩個外部的理解脈絡，我們還可以從本書的相關資訊來獲得理解的第三層脈絡。本書的書名、編者與結構提供了相關的訊息。首先，書名除了確認“公民身份”與“東亞社會”兩個研究領域的交集以外，似乎還希望讀者能夠注意到其中的“爭議性”（contested）面向。而本書副標題進一步指出了發展型政治（developmental politics）、國族一致性（national unity）、全球化（globalization）三個關鍵議題，提醒著讀者將公民身份在東亞社會所引出的爭議性，呈現在這三個議題的交集之下來理解。其次，本書是兩位編者Bryan S. Turner與Chang Kyung-Sup（張慶燮）在學



術合作與發表規劃之下的產物。在學術研究取徑上，讀者可以預期，Turner對於公民身份研究在非西方社會的應用，與張慶燮對於東亞政治發展研究之間，可能產生的學術激盪。<sup>3</sup> 同時，兩位編者也說明了本書的規劃過程：來自不同學術場合研究論文，經由數次的交流討論與整體編輯之後才得以選入本書。第三，本書結構安排更指出了其研究規劃的學術創新性。Turner與張慶燮在“導言”與“結論”兩文之中，先點出本書的主要論題與診斷，在這兩者之間則是本書的“理論觀點”與“個案比較”兩大部分。“理論觀點”包含了關於架構、歷史、現狀的三篇文章，“個案比較”才分別收錄關於中國/香港/台灣的四篇研究，與日本/韓國的五篇研究。可見，本書依序在主要論題、理論觀點、個案比較上展現了編者與作者們的集體合作。

不論是公民身份研究本身的興起、研究內部的三個主要軸線的外部脈絡，或者是兩位編者在書名與結構上的規劃，都可以共同構成本書的多重理解脈絡，進而提供讀者們得以認識本書之學術定位的重要參照。以下，我們將分透過內容簡介、整體評論、延伸討論的三個部分來介紹本書。內容簡介首先將著重在，Turner與張慶燮對於東亞公民身份狀態所提出的主要論題與現狀診斷，接著介紹本書在理論觀點的部分如何企圖規劃出一種結合研究架構、歷史反思、現狀比較三個面向的理論觀點，最後才說明中/港/臺、日/韓的個案比較研究如何能夠共同凸顯出本書論點。此外，在整體評論的部分，我們將從本書結合公民身份研究與東亞比較研究的學術企圖為基礎，同時對於其中展現的優點與缺點提出相關評論。在這樣的基本評論上，我們嘗試對本書在研究企圖展現的“開創性”同時可能隱藏的代價進行討論（指，研究取徑上的“折衷性”），並且從中發掘對於未來之公民身份研究的可能助益。最後，在延伸討論的部分，我們將以本書其他可能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研究議題為軸，延續Turner與張慶



變兩位編者在本書結尾提到，關於東亞儒學復興與當代德行倫理學的問題，並且提出關於東亞社會公民身份研究的另一種可能方向：在政治經濟與西方社會成爲主要關切焦點的同時，公民身份研究者或許可以從傳統文化與當代倫理的激盪，找到另一種看待東亞公民身份狀態的視野。

## 主要論題與現狀診斷

在導言之中，兩位編者從公民身份與東亞研究之間的理論關連與社會脈絡談起。在理論關連上，從政治轉型與經濟奇蹟到近年來的中國崛起，讓東亞研究逐漸呈現出一種“另類現代性”理論旨趣。但是，目前相關研究對“國家/公民”關係的解釋，仍然在意識型態或文化價值上較爲不足。因此，兩人認爲，若能引入“公民身份”這個關鍵概念，來重新看待“國家/公民”關係與其中相關的政治哲學論述，研究者則可以既批判東亞的威權式“國家/公民”關係，又可以反省東亞的傳統文化（例如：亞洲價值、儒家倫理）的角色。在這種理論視角上，“公民身份”可以透過實質主題、理論關連、分析策略三種不同的方式來發揮作用。在社會脈絡上，兩人指出三個重要的東亞社會特點：發展型政治、全球化趨勢、國族主義與社會政治的不全然相合。一者，在東亞各國的發展型國家所帶出的公民身份授與過程，明顯地與 T. H. Marshall 模式不同，也無法透過社會運動或政治抗爭來理解。二者，東亞各國卻大多認同全球化論述中的新自由主義思維，過快地擁抱“全球競爭力”與“彈性化生產”概念，因而忽視各國彼此之間高度依存與頻繁流動的現狀。三者，在致力發展文化上的國族主義時，東亞各國之內卻同時凸顯出少數族群的



問題（例如：西藏、沖繩），使得近年來歐洲經驗引出的“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理念在東亞社會似乎仍窒礙難行。

在理論關連與社會脈絡的兩面參照中，兩位編者將本書的問題意識定位為：歐美經驗指出，競爭性資本主義在長期發展下能夠透過“公民身份”來保障個人權利（指，不需國家機器過度介入社會生活），這種論點在當代東亞社會中似乎發現了相反的例證？換句話說，兩者認為，東亞社會的公民身份樣貌似乎展現出另一種圖像：威權主義或國家主義的資本體制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以經濟保障來換取公民身份的新邏輯？

對於本書提問，兩位編者在結論，〈萎縮的東亞公民身份？〉一章指出，東亞公民身份的變化趨勢，必須先由類型學的區分作為討論架構。以國家、市場、市民社會的關係為基礎，作者們區分出三種類型。類型一，國族公民身份（以政治認同、兵役或公職為例）、類型二，市場公民身份（以勞動力參與、工會連結為例）、類型三，社會公民身份（以志願結社活動、積極公民意象為例）。建立在本書的個案比較研究上，兩者指出東亞社會的公民身份整體趨勢為：由類型一逕自向類型二過渡，而忽略類型三的發展。建立在這樣的論點上，兩者提出了未來的三個診斷：1.全球化的經濟影響力加劇東亞內部競爭、2.人口結構變遷（指，老化與遷移）的影響力持續作用、3.文化上的消費主義與社會上的青年失業緊密結合。最後，兩者以本書結論的定位為基礎，來對話西方社會中的兩個重要公民身份研究論點：D. Bell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論題與M. Somers的“公民身份契約化”的論題。

兩位編者們卻認為，東亞社會的公民身份發展趨勢（指，由國族型轉向市場型，而忽略了社會型的公民身份）與當代西方社會的趨勢相似！但是，其中差異之處在於：西方社會的公民身份發展過程中，政治的“改良主義”（reformism）扮演了關鍵



的角色，反觀東亞社會的狀況則是市場力量取代了這個角色。因此，Bell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文化矛盾（指，由新教倫理到消費主義的演變）分析，似乎正好說明了這個東西方社會相似的趨勢。但是，兩位編者卻認為，從“公民身份”的研究角度來看，似乎可以提出一個新的Bell論題：矛盾之處不在於文化演變中的兩種價值觀，而在於“政治型/社會型的公民身份”與“市場型公民身份”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兩位編者也印證了Somers對於“市場基本教義派”的批判。Somers指出，失業率與基本薪資的變動趨勢，指出了一種公民身份發展過程逐漸“契約化”的趨勢。這種趨勢把公民身份的“政治責任”與“社會連帶”判準，轉換為以“經濟交換”為主要判準，因而使得公民身份與市場力量的之間關係由“抵禦”轉為“助長”。兩位編者似乎認為，Somers對於美國社會近年來的批判，反倒指出了東亞社會的公民身份的長期發展的內在隱憂。

## 理論觀點：研究架構、歷史反思、現狀比較

除了在導言與結論提出的主要論題與現狀診斷，本書更在第一部份透過三個章節在研究架構、歷史反思、現狀比較的三個面向上，建立起關於東亞公民身份狀態的統整性觀點。因此，讀者們可以發現，在第一部份的第一至三章之中，Turner、Dirlik、張慶燮分別從這三個面向，為本書之後的個案研究，預先鋪陳出了一個比較研究的理論背景。

在第一章（國族公民身份與社會公民身份：現代公民身份的一些結構與文化問題），Turner延續自己的公民身份動力學與類型學考察<sup>4</sup>，提出新的區分“政治的/社會的”公民身份。“政治公民身份”的概念多為現代革命以前的古典公民身份，“社會



公民身份”的概念則包含了普遍福利的現代公民身份。在此區分上，Turner 得以重新看待不同個案之間的比較，例如：英國/美國的比較，前者重社會福利後者重經濟自立、德國—日本/以色列—馬來西亞的比較，前者重國家力量後者重宗教力量。在分析上，Turner 認為，政治公民身份指出了“國家向下的政策力”，社會公民身份則指出了“市民社會之間的連結力”。兩概念之間的不同處在於，地域與權利在範疇上的高度交集，但是，兩概念所涉及的社會威脅因素卻有所不同，政治公民身份主要受到（合法或非法）國際移民的衝擊，社會公民身份則主要被人口結構變遷所影響（例如：高齡社會、低出生率）。從兩種公民身份在結構上展現出的共同與各別問題出發，Turner 同時提問的文化方面的問題：東亞社會向來較重視“群體關係”的文化特質，在上述的結構性衝擊下是否仍能維持住（政治或社會）公民身份的發展？

在這個新的區分下，Turner 比較了亞洲的日本與中國近代史，認為兩者都是由國族（政治）公民身份的打造，轉向社會公民身份的維護與困難。總體而言，Turner 指出，當代亞洲的公民身份發展有三議題：1. 儒家思想仍是主要的文化限制，即使當代的新儒家學者卻提出了相反的詮釋、2. 缺乏有利的中產階級作為主要推動者，或者中產階級多為國家型布爾喬亞、3. 軍事民主化促進社會民主化的過程，也造成傳統意識的文化創傷。最後，Turner 仍認為，東亞公民身份也與西方社會出現了相似的轉型與危機。在年金私有化與軍事外包化的例子中，Turner 發現，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改革計畫，造成了政治或社會公民身份皆轉向“消極型的消費者式”公民身份。此外，勞動條件低落與人口持續老化，也使公民身份的發展受到了威脅。其中，東亞社會中的新加坡與香港是代表例子。

在第二章（殖民主義、革命與發展：從歷史觀點來看東亞政治抗爭中的公民身份）中，Dirlik 提醒到，民族國家與歷史文化兩



因素在“主體/公民”之間的關鍵作用。首先，Dirlik指出，民族國家與公民身份的關係仍然密切。不論是“國家”控制的各種基本資源，或是“民族”提供的文化認同，都是公民身份的重要條件。Dirlik也贊同Turner回頭重視“國族公民身份”概念的立場，並且認為目前研究者對於“國家之外的選項”（例如：地方社群到全球人類）的期望仍有待評估與觀察。理由在於，Dirlik發現，回應全球化衝擊與新自由主義思維的有力單位仍是民族國家。第二，延續Turner“將儒家思想視為公民身份發展之阻礙”的論點，Dirlik認為，我們不能只是以儒家文化來理解東亞特殊性，而必須回到東亞社會從19世紀開始的高度互動過程。多元宗教文化（例如：三會、薩滿、神道）、關係主義觀念（例如：親族與家族）、殖民經驗（例如：國族主義與反帝國意識）指出了東亞現代性的特殊點。其中，國家建構與公民建構之間的矛盾（例如：富強說vs.新民說），使得東亞公民身份帶有一種威權主義色彩。最後，Dirlik對現狀提出一些診斷：1.東亞公民身份呈現出一種“未完成狀態”，其中更區分為發展不均（指，台日韓）與發展阻礙（指，中國、北韓）兩類、2.不論是“發展型公民身份”或“爭議性公民身份”概念，本書研究者的立場都是意在對抗主導性的“消費者公民”與“經濟發展至上”論述、3.國際移民對於國族認同產生的衝擊仍然重要。

在第三章（異床同夢？東亞的國家社會關係與公民身份體制）中，張慶燮以“國家/社會”關係來理解公民身份體制在東亞不同社會中的發展狀態。在中、日、韓三國的發展簡史之上，張慶燮嘗試把“東亞公民身份”加以概念化，並討論幾項特質：1.政治的威權性導致市民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皆以自由主義者為依歸，經濟的企業主導性使得福利體系呈現出保守性格、2.政經發展產生了侍從性的布爾喬亞，民間結社並非自由主體間的交流，而呈現出“參照性”（referential）的特質、3.儒家思想由過去的傳





統轉向現代資源，其中，對婦女與青年的貶抑、公共事務的家庭化（私化），是兩個關鍵文化阻礙。最後，張慶燮認為，從“公民身份”觀點重新出發，似乎可以使研究者轉換既有的分析視野，由東亞各國之間的差異點轉而重視相似點（指，有著相似的發展期許或抗爭過程？）。

### 個案比較研究：中國/香港/台灣、日本/韓國

有了以上的理論背景做參照，本書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則分別收錄了針對中國/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的個案研究。雖然不同的個案研究都有著自己所欲提出的發現與論點，但是，讀者們仍然可以將它們放回本書所開出的主要論題與理論參照之中作思考。

關於中國/香港/台灣的部分，本書第二部分共有四個章節，分別由兩章探討中國大陸近年來的財產權草根運動與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兩章討論中國與台灣關係、中國與香港關係下的特殊公民身份議題。第四章透過住屋所有者的權利抗爭運動，說明了抗爭者對於自身公民權利的維護，而其中關鍵並不由黨政方面的法律問題所決定。相對於此，如何在國家機器、私人企業、抗爭民眾所形成的不同行動層次間，採取對應的策略考量，才是抗爭運動的關鍵所在。第五章則是藉由就業問題的研究，反映出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在當代後社會主義中國脈絡中，如何涉及“企業公民身份”（corporate citizenship）同時帶有的兩種不同文化意義：企業既必須以穩定的獲利成長為其存在基礎，又必須持續創造與穩定維持就業市場。第六章以長期在中國的台商為研究對象，指出了“彈性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同時展現出的兩個對比意象。一方面，中國政府當局在各種政治與經濟利益上透過台



商來對於台灣政府產生壓力與形成偏好，另一方面，台商本身卻又比中國人或台灣人更自詡或親近於新自由主義的理念。第七章則透過中國與香港兩地之間的留學生作為對比，指出其中極為相反的態度與意象。中國政府對於求學於內地的香港學生，抱持著工具性立場並且期望透過他們對香港政府施壓，因而展現出包容傾向的制度設計。香港政府卻對於在香港求學的中國大陸學生採取嚴格立場，認為他們出於自利因素，因而傾向對他們緊縮各種公共支持。

關於日本/韓國的部分，本書的第三部分共有五個章節，分別由兩章探討日本的公民身份爭議，三章探討南韓的狀況。第八章說明了日本近年來的社會照護體系，由於人口老化與經濟變動的影響，進而受到婦女團體的抨擊。建立在家庭照護第一位與經濟來源第二位的日本婦女，如何提出各種關於社會照護的改革主張，用以保障日本婦女在生活狀況與家庭地位的社會權利。第九章則以沖繩的特殊歷史個案為基礎，說明了在美國與日本關係的幾度變化之下，原本的琉球人轉為日本公民（沖繩人）的過程中，如何混同了對抗與接受的成分，進而形成沖繩人民的日本公民身份認同。相對於此，第十章則開始探討南韓在國家發展以經濟為導向的趨勢中，如何形成一種“發展型公民身份”的概念。此概念指涉到發展型國家為了經濟利益，而在國家與公民關係上產生了相關的箝制。作者更認為，“發展型公民身份”的趨勢並非南韓特例，在東亞其他國家也可以發現，甚至，在近年來的後社會主義國家（例如：中國與越南）也出現類似的趨勢。第十一章針對南韓近年來的外籍配偶（以女性為主）的問題，探討了多族群家庭所產生的多元文化主義對於韓國傳統文化下的父權意識型態之衝擊。由於南韓政府對於外籍配偶的公民身份政策與其相關的制度性支持，促使這種多族群家庭之中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得以稍微改變了傳統南韓家庭中的父權主義。第十二章則以北韓



政治難民為個案，說明了南韓政府受到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影響，如何由過去禮遇優待“反共義士”的態度，轉變為處理“北韓移民”的一般待遇。這樣的轉變也同時說明了北韓政治異議人士開始逐漸以南韓之外的其他國家，做為他們尋求政治僻護的選擇。

## 初步評論

我們可以透過從以上的介紹對於本書有了初步的認識，並且也瞭解兩位編者的整體規劃與主要論點。整體來說，本書的集體合作的確展現了自身特有的研究企圖。首先，本書兩位編者精心規劃之下，本書嘗試著為近年來針對東亞社會進行的各種公民身份研究，提供了一個較具有統整性的研究架構與核心論題。不論是針對中國、日本、韓國的各種地方性維權的個案研究，或是針對台灣、香港的各種跨區域的邊界研究，都可以在本書提出的“東亞公民身份”論題找到得以參照的基礎。其中，“以經濟發展犧牲政治權利與社會權利的公民身份現狀”，則是幾個東亞社會所共同面對的困境。在本書所提出的研究規劃之中，預見了未來研究者欲針對東亞個別國家所進行的公民身份研究時，勢必無法自外於整體區域狀態的參照框架。第二，本書藉由Turner近年來的公民身份社會學研究，重新呈現出東亞社會在全球化趨勢下的特殊性。透過“公民身份”概念對於歐美社會所進行的比較研究，除了突顯出不同民族國家格局所呈現的差異之外，更間接地呈現不同社會隱藏在公民身份概念下的社會分類問題。<sup>5</sup> 本書的貢獻更在於延續此種比較架構的研究旨趣，將東亞社會接觸“公民身份”概念與其制度的過程，重新解析兩種不同的問題面向。一方面，是現代民族國家所面臨的國族文化維持問題，包含與此問題在東亞各國的高度經濟競爭之下的新狀態，另一方面，則是



“公民身份”概念的發展所間接隱藏的社會分類問題，市場-經濟公民身份的主導狀態使得人群連帶有了新的分類邏輯。

第三，本書的主要論題在既有的公民身份研究中，引出了一個值得後續研究者進一步追問與對話的提問：公民身份在發展上的犧牲邏輯。不論是Turner提出“市場型公民身份”概念，或是張慶燮使用的“發展型公民身份”概念，都使得讀者逐漸發現，T. H. Marshall架構的問題似乎不在於發展順序上或者權利面向上。本書的研究發現似乎對於T. H. Marshall架構，提出了比“演化觀”更為徹底的質疑，並且以東亞公民身份狀態為例，指出了公民身份的不同權利面向更可能在彼此衝突的關係下，是以“互為代價”或者“相互犧牲”的方式來發展的！因此，對於公民身份社會學的比較研究來說，或許更為迫切的研究問題不再是，公民身份的不同面向如何依序發展或者發展受阻，而是公民身份發展的過程中所內含的不同權利之間相互阻礙問題。在本書引出此類思考的同時，讀者們也可以再次由公民身份研究回到東亞社會研究，去反省一個發展社會學與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研究旨趣：作為全球化發展或現代性狀態上的後進者，東亞各國是否在公民身份狀態上呈現出一種與歐美社會不同的發展邏輯？

在引發關於公民身份與東亞社會的研究發展的同時，讀者們或許仍需要對本書中的幾個問題特別留意。這些問題雖然未造成整體性的影響，但是，若讀者更有意識地在閱讀過程中關照到它們，則可以為本書的作者們與讀者們之間建立更有益的研究刺激。

首先，讀者們必須注意到本書在公民身份研究上的可能引出的詞彙混用與概念區分等問題。在理論架構的部分中關於“政治的公民身份/社會的公民身份”的新區分，與結論部分提出關於“國族公民身份/市場公民身份/社會公民身份”的類型學，我們必須對於本書意欲有別於T. H. Marshall架構的研究旨趣保持著格



外的注意。在Marshall已為人熟悉的“civil rights/political rights/social rights”三分法，與本書提出新的二分法或三分法之間，讀者必須格外關注其中的相同處與差異點。在Marshall的架構中，造就其中三分法的關鍵，在於英國法律發展史對於不同權利類型的演進式保護措施，相對於此，本書所提出的這兩個新區分架構，則有著更為特定的研究旨趣。一方面，Turner說明了“政治的/社會的公民身份”之別，在於區分古典型態與現代型態的差異。甚至，我們可以將此區分視為對於當代“公民共和主義”呼求的回應，指出此種以古諷今或以史為鑑的侷限所在。另一方面，“國族/市場/社會公民身份”類型學更是建立在與“國家/市場/市民社會”的實踐性關連之上，進而使本書研究者能擺脫公民身份自始至終只能被視為國家機器所保障的制度性作為。可見，讀者們要能不困惑於本書所提出的詞彙與分類，則勢必要更注意本書研究者所欲呈現的特殊提問方式。

延續著上述問題，讀者們或許會想要進一步提問：本書所收錄的諸種個案研究，是否與其整體性的研究架構有所呼應？然而，衡諸本書中對於中國、香港、台灣的個案研究，或者對於日本、韓國的個案研究，我們似乎未能發現它們與本書的理論架構之間有著緊密的呼應關係。可以確定的是，兩位編者將本書的主要論點建立於東亞社會的區域層次，往上與歐美社會或其他非西方社會的公民身份研究進行對話，往下將中國、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等地的個案比較研究進行整合。或許，有讀者會質疑本書的整體研究架構與部分個案研究之間的關連性，但是，我們卻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本書融合不同研究取徑（指，公民身份研究與其他研究）之間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在本書強調“公民身份研究”所能帶出的新視野、強調公民身份概念之中所內含的“爭議性”時，我們可以思考：公民身份研究與其帶出的爭議性，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讓研究者們脫離既有研究



取徑的限制呢？這樣的提問構成了我們對於本書的主要評論立場，同時也指出本書可能帶出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在強調公民身份研究與其概念的爭議性時，研究者如何能夠免於在新興的公民身份研究與既有的市民社會研究之間猶疑不定？

### 公民身份研究的爭議性與新穎性？

Turner 與 J. C. Alexander 之間的意見交流，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點，也使我們可以更為脈絡性地理解“公民身份研究”究竟能如何有別於各種關於市民社會（或其他非屬於國家或市場的第三領域）的研究。<sup>6</sup> Alexander 認為，近年來蓬勃發展的公民身份研究，似乎大部分仍可以被理解為對“市民社會”進行的相關研究，因此，大部分的公民身份研究者仍然注重市民社會之中的權利爭取與其衍生的爭議性問題。對於這樣的詮釋，Turner 則表達了明顯的反對，並且提出自己為公民身份研究所界定的特殊性。Turner 在整合“公民身份”研究與“權利抗爭”研究的過程中，同時也積極地指出，社會學研究者長期以來在將解釋機制歸諸於“社會秩序”時，仍然過度重視集體解釋而輕視個體解釋。正因如此，各種關於社會第三領域的研究論題（例如：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社會資本等等），對於社會行動或社會實作如何進入行動者本身經驗，進而產生相關的“證成”（justify）過程，仍然有著解釋機制上的瑕疵。重新整合公民身份與人權論述，在 Turner 看來，正是針對此項理論瑕疵所進行的新興研究取徑。對於社會學傳統之中略帶抗拒卻解釋不足的“個體”問題，“公民身份”概念可以對其有所深化，也因此有其研究取徑上的特殊性與理論上的重要性。



雖然Turner已經明確地表述了自己的研究立場，也定位了公民身份研究的新穎之處，但是，我們仍然未能在本書的諸多個案研究之中看到此種特殊理論立場與研究取徑的影子。在關於東亞社會中的各種公民身份爭議或抗爭中，個案研究大多描述了公民或準公民（甚至非公民）如何針對國家體制或針對市場機制進行自己的社會抗爭。對於這些“爭議性”的研究，指出了行動者們如何依此類抗爭來形成特有的身份認同與社會連帶，但是，在這些個案研究的背後卻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理論陷阱：研究者的目光過度聚焦在受到被研究者的反抗對象之上，因而忽略了其他相關的可能性。這也是既有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社會資本等相關研究所受到的批評，相關研究者在其研究對象的兩種不同旨趣（反抗國家或建立連帶）之中，選擇了較為明顯的、較具對抗性的“反抗國家”，因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研究面向。在當代歐美社會的公民身份研究之中，不同權利類型之間的先後演進，或者不同權利團體之間的相互學習，也是研究者必須高度重視的關鍵問題。舉例而言，勞動權利與工運抗爭對於公民身份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地位，其中關鍵在於，它既可能構成了後續相關權利的援引，或其他身份團體（例如：性別、族群）的模仿，也可能同時在資源規劃與文化抗爭上阻礙了其他權利或身份團體的發展。

因此可見，促使公民身份研究脫離既有研究的侷限，其中關鍵未必只是堅持選擇何種概念工具（指，公民身份或市民社會）或分析架構（指，“國家/社會”關係或“國家/市場/社會”區分）的問題，更可能是涉及到觀察視角與研究面向上的轉換。本書較為可惜之處或許在於未能深化此問題。一方面，Turner、Dirlik、張慶燮三位作者所共同規劃出來的“理論觀點”即未能強調這個視角轉換的關鍵性，另一方面，在其他研究者的個案比較也未能兼顧到反抗運動或權利爭議之外的其他面向。事實上，當代幾位重要的公民身份研究者也分別指出了，公



民身份研究得以區別於既有研究的可能性。消極地來看，Somers提醒了公民身份研究者，必須注意到“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概念在“知識論框架上的社會自然主義”(social naturalism)。<sup>7</sup>這樣的警覺使研究者得以在公民身份研究之中，指認出逐漸受到市場教條主義或國家放任主義所影響的“契約化”問題，進而使研究者不受制於現狀問題。積極地來看，J. Barbalet與F. Isin的公民身份研究都致力於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動態關係與其演變過程。<sup>8</sup>Barbalet把公民身份的授與/爭取問題，重新放回各種社會團體之間的“情感問題”(指，文化模仿或嫉妒心態)，並以此來理解權利爭議性的集體動力。Isin把公民身份問題所帶出的多元社會團體區隔，進一步分為“連帶性、對抗性、異己性”三種的關係，來維持保持研究權利爭取過程的社會動態性。

除了上述注重團體動態關係作為研究焦點之外，公民身份研究如何脫離既有研究限制的可能性，也在於研究者如何重新看待“民族國家”與“國族主義”的關鍵作用。如Turner在本書所提出的關鍵反省：T. H. Marshall以降的公民身份界定方式，其實為三種權利類型預設了一個民族國家的架構。然而，研究者對此種預設的修正，卻容易落入“反抗國家”或“(要求國家代為)反抗市場”的研究陷阱之中。Turner提出“國族公民身份”(national citizenship)的概念似乎指出了一個可能的解套之路，只不過其中仍然需要進一步的討論與延伸。在本書“理論觀點”部分，Turner、Dirlik、張慶燮都已經意識到，東亞社會的文化內在緊張性在於，文化資源或意識型態同時表現在普遍性的儒家文化與特殊性的國族主義的競爭衝突。然而，三人都從歷史發展的考察之中，把這個文化緊張關係以“殖民/去殖民”來理解成兩種獲得抒解的方式。一種理解方式，是殖民時期對抗西方文化下的東亞儒家文明與國族自強情節，兩者的緊張在合力對外的過程暫時被容忍，在去殖民時期之後兩種文化資源之間卻也失去了相互衝





突的必要。另一種理解方式，是在去殖民時期主導著東亞各國的全球化政經趨勢（指，經濟分工與政治佈局），削弱了東亞各國內在的文化緊張性，使原本共享的儒家文化與個別的國族主義的衝突趨緩，甚至彼此還可以發展出共存的可能。這樣一來，本書的此種理論觀點卻又同時回到民族國家打造“現代公民”過程中的政經力，進而忽略了其中的文化力。

這樣的問題使得公民身份研究者仍然據守在國家體制對於公民（或非公民）主體的制度性資源授與問題，忽略了國家之所以能夠跨越其他社會團體而主導現代公民的形塑，其中關鍵正在於它操控了帶有普遍性宣稱的文化論述資源。雖然 Dirlik 指出，我們可以在“主體/公民”之間的關鍵轉換，發現國家同時呼籲著政治經濟危機與文化國族危機，但是，在本書的其他個案研究之中卻過快地認為，國族文化所打造的“現代公民”承受不了政治與經濟權利方面的不正義。事實上，我們仍然可以在本書各種實例研究之中，發現相關行動者在爭取其公民身份的過程中，再次訴諸各種文化性與普世性的權利修辭。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由現代公民的“主體形成”問題之中，區分出公民身份研究的新穎性，亦即：重新關連到認同政治研究中對於“承認或再分配”爭議。<sup>9</sup> 舉例而言，民族國家對於其區域內的特定人群所擁有之文化地位，是以“人道關懷”或“守護公民”來加以承認，決定了依此產生的不同制度性資源配置。可見，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條件上，不同的主體地位如何被賦予不同種類的公民狀態，實則是一個為複雜的過程，或許無法僅以社會經濟條件的缺如來看待公民地位爭取的問題而已。更廣泛地說，在文化承認問題與資源分配問題之間的實作從屬或邏輯順序，目前似乎仍然持續地處於被爭議狀態。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本書在理論架構與個案研究之間看似落差的問題，實則可以引出一個更豐富的討論，亦即：公民身份



研究的爭議性與特殊性。乍看之下，讀者們或許會著眼於本書未能完整地表現的研究規劃，但是，我們卻認為，本書在理論觀點之中即帶有某程度的折衷性，因而未能更明確地表現出公民身份得以區別於既有研究與其侷限的可能性。或許在當代研究者更重視“團體動態”與“主體形成”的問題，並且重新以此兩問題的重組來看待“市民社會”研究之後，公民身份研究在理論旨趣與研究取徑上的特殊性才能更被凸顯出來。依此，讀者們也才更能理解本書所規劃的研究企圖，與其中未被實現的可能性。

## 延伸討論

除了本書從公民身份研究來重新看待東亞社會的企圖之外，我們仍然可以回到本書兩位編者最初的提問，以提供讀者們進一步延伸思考的空間。當本書兩位編者指出，東亞社會既有的研究傳統對於“國家/公民”關係的解釋，仍然在意識型態或文化價值方面較為不足。這樣的研究關懷無疑會引起讀者的追問：東亞社會在繼受西方政治哲學論述的過程尚有不足之處，或是，東亞社會本身的整體文化價值之中並沒有相關的論述資源？相信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本書兩位編者都承認，東亞社會在19世紀的西風東漸過程中，並不缺乏引入啟蒙思想與其後相關論述的承載者。有趣的地方更在於，這些關鍵的歷史行動者與承載著傳統理念的文化知識份子，無論在社會生成或政治發展上並非彼此陌生或無所交集。從這樣的歷史經驗出發，本書讀者們或許會對於Turner在公民身份研究的另外一個相關主題感興趣，亦即：一種新普世主義思想(cosmopolitanism)的建構。<sup>10</sup>

Turner在近年的公民身份研究之中，嘗試著發展一種對於其他文化也加以關照的“普世主義倫理學”。他認為，建立在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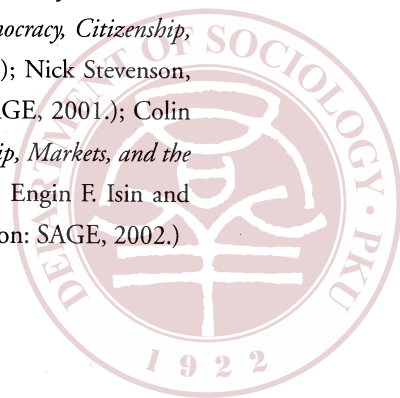


的社會共存狀態下，公民身份與普世人權的研究其實共享著兩個現代社會的特質：“本體論脆弱性” (ontological vulnerability) 與“政治不穩定性” (political precariousness)。不論是公民身份或權利論述，Turner總是在其中發現某些高於其成員歸屬邊界的意識型態或理念宣稱（例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甚至，將這些規範性論述也進一步成爲公民身份在成員歸屬上的隱喻形式。這些規範性論述立基於各種“具身形”經驗而不假外求，Turner稱其爲“普世主義德行” (cosmopolitan virtue) 或“德行倫理” (virtue ethics)。從這樣的研究角度出發，Turner已經開始嘗試著將“儒家思想”視爲一個可能的選項，至少，對於東亞社會的公民身份發展來說，或許是未來的一個可能性。<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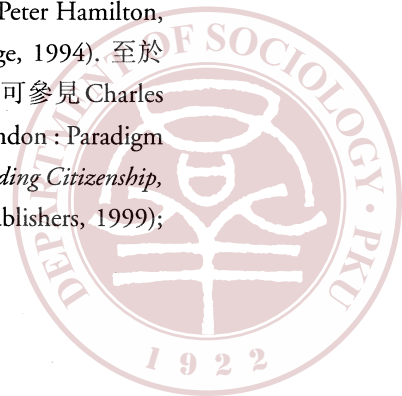
儘管上述延伸討論的發展軸線目前仍然未見具體的研究成果，但是，對於所有關注公民身份與東亞社會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本書仍然提出了一個關鍵的理論架構與嘗試，並且也留給當代研究者許多值得討論與發展的空間。

## 注釋

- 1 針對“公民身份”概念所編輯相關論文集，請可見 Chantal Mouffe, ed.,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2.); Bryan S. Turner, ed.,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3.); Bryan S. Turner and Peter Hamilton, ed., *Citizenship: Critical Concepts. Vol. 1-2*. (London: Routledge, 1994.); Martin Bulmer and Anthony Rees, ed., *Citizenship Today: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 H. Marshall*.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6.); Charles Tilly, ed.,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Engin F. Isin, ed., *Democracy, Citizenship, and the Global C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Nick Stevenson, ed., *Culture and Citizenship*. (London; Thousand Oaks : SAGE, 2001.); Colin Crouch and Klaus Eder and Damian Tambini, ed., *Citizenship, Markets, and the Stat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ngin F. Isin and Bryan S. Turner, ed., *Handbook of Citizenship Studies*. (London: SAGE, 2002.)



- 2 T.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pp. 65–123. 本文除了1949以演講稿形式發表之外，之後也在1964、1972年分別被重新收錄於不同出處，詳細介紹請參見Robert Pinker, "Introduction" In *The Right to Welfare and Other Essays*, T. H. Marshall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1), ch 1.; Martin Bulmer and Anthony Rees, ed., *Citizenship Today: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 H. Marshall*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6), ch 1.
- 3 關於本書兩位編者在公民身份研究的相關著作，請參見Bryan S. Turner, ed.,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3); Bryan S. Turner and Peter Hamilton, ed., *Citizenship: critical concepts. Vol. 1–2*. (London: Routledge, 1994); Engin F. Isin and Bryan S. Turner, ed., *Handbook of citizenship studies*. (London: SAGE, 2002); Engin F. Isin, Peter Nyers and Bryan S. Turner, ed., *Citizenship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Guy Ben-Porat and Bryan S. Turner, ed., *The contradictions of Israeli citizenship: land, religion, and stat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Chang Kyung-Sup, *South Korea under compressed modernity: famili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4 Turner認為，自己在1990年之前已經初步建立一個關於“公民身份”的研究框架，其中，一方面在於指出公民身份的授與動力，在於不同社會採取了社會改革、社會運動到社會抗爭的不同形式，另一方面，這些社會動力也必須放回歐美社會本身在公/私領域與國家/社會關係的不同類型。關於Turner在公民身份之動力學與類型學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請參見Bryan S. Turner, *Citizenship and capitalism: the debate over reformism*. (London ; 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 Bryan S. Turner, "Outline of a Theory of Citizenship." *Sociology*, 24, 2, (1990), 189–217.
- 5 在1994年編輯的論文集之中，Turner與Hamilton就發現了這個關鍵問題：在同樣使用“公民身份”一詞時，歐美不同社會之中卻有著各自的重要社會分類範疇隱藏於其中。例如：在英國的階級問題、歐陸的福利問題、美國的種族問題。請參見Bryan S. Turner and Peter Hamilton, ed., *Citizenship: critical concepts. Vol. 1–2*. (London: Routledge, 1994). 至於將這樣的問題意識重新放回不同社會的歷史脈絡之中，可參見Charles Tilly, *Identities, Boundaries, and Social Ties*. (Boulder, Colo.; London : Paradigm Publishers, 2005); Michael Hanagan & Charles Tilly, ed., *Extending Citizenship, Reconfiguring Stat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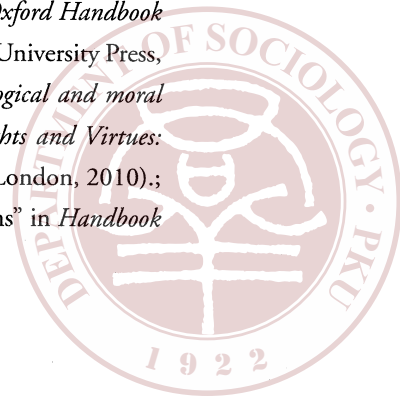


Charles Tilly, "A Primer on Citizenship." *Theory and Society*, 26, 4, (1997), 599–602; Charles Tilly, "Where do rights come from?" In *Democracy, Revolution, and History*, ed., Theda Skocpo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5–72.; Dominique Schnapper, *Community of Citizens: On the Modern Idea of Nationalit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Séverine Rosé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Dominique Schnapper, "The European Debate on Citizenship." *Daedalus*, 126, 3, (1997), 199–222.; Rogers Brubaker, *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ew York: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9).; Rogers Brubak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對於兩者的意見交換，請參見 Bryan S. Turner, "The Enclave Society: Towards a Sociology of Immo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0, 2, (2007), 287–303.; Bryan S. Turner, "Civility, Civil Sphere and Citizenship: Solidarity Versus the Enclave Society." *Citizenship Studies*, 12, 2, (2008), 177–184.; Jeffrey C. Alexander, "Civil Sphere, State, and Citizenship: Replying to Turner and the Fear of Enclavement." *Citizenship Studies*, 12, 2, (2008), 185–194. 從社會學內部相對位置來看，Turner 發現，現代社會（近兩百年的發展）或者當代社會（大多表現為民主性的社會秩序）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三種學術立場或研究典範：1. 市民社會（文化性）、2. 社會資本（社會性）、3. 公民身份（個體性）。Turner 認為，前兩種研究典範即使強調了文化溝通或社會參與的差異，其中卻仍有不足之處，因為，對於看重公民身份或權利 述的公民身份研究典範來說，前兩者共同展現了一種偏傾的預設：對於行動者的各種「證成」(justify) 過程之分析仍然偏重集體解釋，而忽略其中的個體過程。依此來看，Turner 的立場認為，「市民社會」與「社會資本」論題在近幾年社會科學研究之中的復興趨勢，過度受限於18–9世紀的啟蒙傳統對於「文明性」(civility) 與「社交性」(sociability) 的依賴，因而使研究者容易忽略其中對於「個體性」(individuality) 的隱性預設。若欲平衡社會學傳統中這種「社會連帶 (solidarity) 重於個體性 (individuality)」的缺陷，則研究者致力於發展「公民身份的社會學」則有反省與回饋的可能。所以，Turner 指出，正面地看待公民身份與權利 述的研究，有助於修正社會學傳統長期對於個體主義所具有的偏見（否定與懷疑的態度），甚至，有助於引導此研究典範脫離啟蒙傳統的思維模式。



- 7 Margaret R. Somers, *Genealogies of Citizenship: Markets, Statelessness, and the Right to Have Rights*.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79.
- 8 Jack. M. Barbalet,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Macro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6–148.; Jack M. Barbalet, “Citizenship, Class Inequality and Resentment.” I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ed., Bryan S. Turner (London ;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3.), 36–56.; Jack M. Barbalet, “A Social Emotions Theory of Basic Right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31:3, (1995), 36–44.; Engin F. Isin and Patricia K. Wood,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9).; Engin F. Isin, *Being Political: Genealogies of Citizenship*.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Engin F. Isin, “The Neurotic Citizen.” *Citizenship Studies*, 8, 3, (2004), 217–235.; Engin F. Isin, “Engaging, being, political” *Political Geography*, 24, 3, (2005), 373–387.
- 9 參見 Nancy Fraser,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Nancy Fraser, “Rethinking Recognition.” *New Left Review* 3 (2000), 107–120.; Nancy Fraser, *Scales of Justice- Reimagining Political Spa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Trans. by Joel Golb, James Ingram, and Christiane Wilke, UK: Verso Press, 2003).; Axel Honneth,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Trans. by Joel Anderson, UK: Polity Press, 1995).; Richard Rorty, “Is Cultural Recognition a Useful Concept for Leftist Politics?” *Critical Horizon* 1:1 (2000), 7–20.; 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d., Amy Gutman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0 請參見 Brayn S. Turner, “Cosmopolitan Virtue: On Religion in a Global A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42:2, (2001), 131–52.; Brayn S. Turner, “Cosmopolitan Virtue, Globalization and Patriotis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 1–2, (2002), 45–63.; Brayn S. Turner, “Max Weber on Islam and Confucianism: the Kantian Theory of Seculariz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ed., Peter B. Clark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79–97.; Brayn S. Turner, *Can we live forever? A sociological and moral inquiry* (Anthem Press, Londo, 2008).; Brayn S. Turner, *Rights and Virtues: Political Essays 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Bardwell Press, London, 2010).; Brayn S. Turner,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Handbook*



of *Cultural Sociology*, eds., John R. Hall and Laura Grindstaff and Ming-Cheng Lo (Routledge, UK, 2010), 677–685.; Brayn S. Turner, “Rights, Recognition and Relativism” in *Cultural Citizenship and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eds., Wenche Ommundsen and Michael Leach and Andrew Vandenberg (Hampton Press, USA, 2010), 25–50.

- 11 從「人權論述」的歷史發展之中汲取相關普世主義價值，Turner 借用「德行倫理」(virtue ethics) 一詞來統稱各種普世主義價值觀，其中大致上可從五種特性來討論之：1. 與自身文化處境保持距離的「反諷性」2. 與其他異文化保持關連的「反身性」3. 對於現代性大敘事所持有的「懷疑論」傾向4. 對於其他文化處境之中採取的「關照性」5. 對於各種文化之間不可避免的交流所採取的「接受性」。而 Turner 也同時透過這些特性為參數，重新將相關的歷史研究與論述研究加以整合進他的權利社會學架構之中，而避免進行純粹規範性的討論。請參見 Brayn S. Turner, “Cosmopolitan Virtue: On Religion in a Global A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42:2, (2001), 131–52.; Brayn S. Turner, “Cosmopolitan Virtue, Globalization and Patriotis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 1–2, (2002), 45–63.

